

留守儿童急需『心灵』扶助

□ 黄博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致使留守儿童数量急剧增长，规模日益扩大。作为一个由老人、亲戚托管养护的弱势群体，农村留守儿童在生活、教育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困境。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已超越进城务工人员家庭问题的范畴，而成为全社会需要直面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政府对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是非常关注的，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来解决问题，比如通过努力缩小城乡差距来促进农民工返乡、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的救助机制、维护留守儿童的教育权益、引导社会成立扶贫基金会、爱心基金会等。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与实施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笔者认为，除了物质层面的帮助，对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关注也至关重要。

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心理问题”。儿童时期是个体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对身心的发展走向、性格及价值观的形成与成熟影响巨大。根据调研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生态文化的缺失是其重要原因。生态文化作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创新、制度规约、行为典范和物质文化，并通过教化、规制、示范、样板等进行生态文化培育，旨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系统的理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支撑。

一是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亲情饥渴状态。孩子成长成才的过程中，来自亲情的关怀、陪伴至关重要，如果亲情缺失或关爱不够，会使孩子处于亲情饥渴状态，对心灵健康造成困扰。尤其在身心发育、学习生活、人际交往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惑时，如果没有亲人安慰和帮助，会非常不利于孩子心灵成长。

二是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自我封闭心理。长期的亲情匮乏会使留守儿童产生深深的失落感和不完整感，从而形成自我

封闭心理，不愿意与人沟通，内心敏感，孤独落寞。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导致其存在被父母遗弃的感觉，往往甘心生活于被遗忘的角落，集体意识较差，排斥集体活动，与外界沟通交流程度较低。

三是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偏激极端意识。留守儿童长期缺乏亲情关怀，具有较强的逆反心理，情绪消极敏感，心理承受能力差，往往不能正确对待挫折苦难及别人的批评教育，甚至产生对抗行为。由于心理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的缺失，留守儿童更易表现出胆小自卑、消极对抗、随波逐流的偏激甚至极端心理。

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需要精准扶助。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急需调适因父母外出打工导致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者之间关系的错位失序，有效扶助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是强化家长的监护责任。政府应引导留守儿童家长深刻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明确教育子女的职责。要转变监护理念，破除那种保障孩子物质生活即可的理念误区，重视亲情交流。通过精准扶贫专项补贴，尽量确保至少父母一方留守，履行其监护责任。相关单位要建立健全在外务工家长与孩子的沟通交流机制，以保障及时沟通，解决困惑，关切孩子的身心发展和精神诉求，要为孩子灌输积极向上的学习与生活理念以促进健康成长成才。另外，要强化临时监护人的家庭教育指导，引导临时监护人更多关注孩子的精神需求，让留守儿童真正感受到家庭温暖。政府部门要强化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实施寄宿制管理，为留守儿童在校提供各种支持。

二是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学校要组织开通亲情热线电话，使外出务工家长可随时与子女和教师联系沟通。在留守儿童父母返乡期间，要组织他们参加家长会或家长课堂，以了解孩子动态，弥补父母不在身边给孩子造成的不良影响。教师应与留守儿童深入交流谈心，给予更多关心爱护，要广泛开展有利于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各类文娱活动。要建立健全留守儿童档案，班主任要全面仔细地将留守儿童在校的各方面表现及时记入档案，并定期向监护人和外出务工家长反映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情况。要大力实施寄宿制管理，针对部分留守儿童不能得到有效监护的情况，可建议家长同意孩子住校。实行寄宿制管理的孩子经历相似，便于集中管理，而且容易唤起学习热情和集体归属感。要设立心理健康咨询室，聘请专业教师担任心理医生，及时解决留守儿童遇到的各种困惑。开展相关心理课程，关爱儿童心理健康，加强临时监护人心理培训，通过定期心理上门辅导，加强农村家庭心理培训。

三是强化社会各界的合力作用。要充分发挥政府、学校、社会团体、基层组织、媒体、家庭等的合力作用，共同汇聚强大的爱心能量，形成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爱心暖流。积极发挥青妇、关工委、志愿者组织的作用，以有力填补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媒体应加大对留守儿童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各方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关注度。要积极构建社会大众关爱平台。政府、基层组织、学校、志愿者组织、家庭等协同合力，共同搭建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综合型平台，积极开展相关活动，比如举办送温暖送爱心活动、帮扶急需心理辅导的留守儿童、开设相关培训讲堂等，通过有效措施以发挥连接政府、社会、家庭、留守儿童的积极纽带作用，针对各类农村留守儿童“心灵贫困”具体问题采取不同有效措施，实现精准对接、精准扶助、精准呵护。

培育生态文化 支撑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我们必须通过培育系统的生态文化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水平。生态文化作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创新、制度规约、行为典范和物质文化，并通过教化、规制、示范、样板等进行生态文化培育，旨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系统的理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支撑。

□ 胡长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解决好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补齐发展中的生态短板，确保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如期实现，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担当。应当看到，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尽管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生态文化的缺失是其重要原因。生态文化作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创新、制度规约、行为典范和物质文化，并通过教化、规制、示范、样板等进行生态文化培育，旨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与物质文化支撑。

第一，以价值认同与观念创新为主

要内容，不断培育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念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涉及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伟大变革，是一项基于理念支撑和公众参与的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各项经济权益的不断实现，人们从祈求温饱到谋求环保，从渴望生存到渴求生态，从讲求生活水平到追求生活品质，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心理诉求与现实状况的反差，使得生态环境的短板愈发凸显。诚然，人们的生活品质与生态环境的质量密切相关，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可以为人们提供安心、放心、舒心、开心的衣食住行。然而笔者在基层调研中发现，人们不同程度地对生态环境保护形势、资源能源挑战、生态权益共享等方面存在认识偏差，从而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认同与观念创新上失之偏颇，影响了公众生态参与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为此，首先，对全国开展的生态文化教育活动进行统一规划与部署；其次，要大力加强生态环境质量及其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教育，形式可以喜闻乐见、灵活多样，如利用知识竞赛、公益讲座、企业征文、电视互动等形式，不断增强人们的环境危机意识、环保知识教化与生态情感认同；再次，要通过政策引导和鼓励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内容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和艺术创作，利用艺术形象在全社会营造“保护生态环境光荣，破坏生态环境可耻”的良好舆论氛围，增强人们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观念认可与价值追求。

第二，以完善制度与落实制度为主要抓手，不断培育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

文化，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展现制度规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在表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资本逆生态性，加剧了资本对自然生态的掠夺、资源能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破坏；但就其本质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本诱因。这一论断昭示我们：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在根本上依赖于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2016年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的集体学习时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安排，应当做到在程度上必须威严，在内容上必须全面，在过程上必须衔接，形成全社会的制度认同与制度思维。这就说明，好的制度重在落实。好的制度设计必须见诸于实践，使之成为行动的规制、规约和规范，才能取得预期的善治效果。应当充分推广生态文明示范区和试验区在“先行先试”进程中所探索与形成的生态补偿和常态化等生态责任制，并使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尤其是由实践而形成的制度理念与范式，是培育形成主体合力的生态制度文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载体。

第三，以榜样示范与先进带动为主要路径，不断培育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文化，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行为典范。在观念文化认同和制度文化内化于心的基础上，做到在实践中外化于行，以此促进形成生态文明的价值取向、道德内省，先进带动、榜样示范，才能将生态行为文化贯彻于人们的具体实践中，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与行动合力。首先，积极倡导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行为并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习惯养成。由

吕祖谦宽宏兼容的治学之道



□ 刁兴泽

在南宋理学阵营中，有一面灿烂的旗帜，这就是乾道、淳熙时期（1165—1189）鼎盛一时的婺学。它以综合当时各家学说为己任，故其思想反映了南宋社会思潮的总趋向。由于其创始人吕祖谦为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一生讲学、著述等学术活动亦以婺州为中心，故这个学派被称为婺学。吕祖谦并不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而是以思想敏锐和学识丰富著称于世，在学业上体现出宽宏兼容的治学之道，使他独树一帜。吕祖谦治学的特点是经史并重，文道并重，道德与知识并重，性理与事功并重，对学术上持不同见解的“相反之论”者，吕祖谦有着宽宏兼容的雅量与气度，深受当时学界的赞誉，亦为后世的楷模。

求同存异，博采众长。这是吕祖谦最大的治学特点，就是不主一家，在调和众家之说的基础上陶铸己说。吕祖谦求同存异、博采众长的治学特点源于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吕氏家学的“杂博”学风。吕祖谦之学“本于家庭”并且从小就跟随伯祖吕本中，濡染颇深，影响很大，而后，其求同存异、博采众长的治学特点逐渐形成并发扬光大。治学思想上他具有宽广的学术胸怀。吕祖谦与当时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张栻、陆九渊、陈亮都有密切的交往。各学派代表人物之间思想学术分歧明显，

弟子门人之间辩论激烈甚至互为水火，但吕祖谦却能不拘于学派门户观念，而折中于调和各家之学，做到兼容并蓄，求同存异，表现出宽广的学术胸怀。《宋史》本传亦称吕祖谦“兼众众说，巨细不遗，挈领提纲，首尾该贯，深然若出一家之言”。治学方法上他提倡学者对不同的学术观点要泛观广接。他认为只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交往，而拒绝不同观点的人于千里之外，不利于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他坚决反对“道不同不相知”的观点，认为这未免“缺乏广大温润气象”。他认为将不同的学术观点视为洪水猛兽，是极不妥当的。正因为这样，才使他超越了当时诸家，形成了自己博大宏富的学术体系。例如，吕祖谦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学术上与王安石分歧也不少，但是他反对将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一笔抹杀。他对别人特别是私交深厚、学术观点颇近的学者之缺点持以公允。他曾批评好友陆于静“病在看人不看理”，这批评是相当尖锐的。他和朱熹的关系可谓莫逆于心，对朱熹的学识也很为推崇，但他很坦率地批评朱熹性子太急，学术气度欠恢宏。

经史并重。宋代史学非常发达，二程、朱熹等理学家对史学研究非常重视，但他们往往将历史研究作为研究天理的一种手段。因此，在经典义理与具体史事之间，他们视义理更为重要，认为经为本、为主，史为末、为次，读书

必须按照经本史末的原则进行。而吕祖谦强调经史并重，显示出与二程、朱熹认识上的差异。吕祖谦认为经史应该相提并论。对于经典，吕祖谦十分重视。他指出：“读经多于读史，如此，然后能久可大。”但同时他不赞同经史有本末、轻重、先后之分，他认为经史是应该相提并论的，学者须“兼看经史”，史籍与经籍一样，都是学者“精熟细看，反复考究”的内容。他重视经史，劝人看《左传》《史记》理所当然，而他 also 重视通史。他留下来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迄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可惜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确是一部严谨的史著，就连朱熹也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仔细”。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东莱博议》，虽是“为诸生课试之作”，却多有他的真知灼见。他甚至将儒家经典《尚书》也归于史籍之列。吕祖谦经史并重，要求学者兼看经史，成为学术界一大特色，开启了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治学路径。

文道并重。吕祖谦少时与伯祖吕本中关系甚密，亲炙其学。吕本中的思想兼有儒、释、道三家成分，“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道出了吕本中治学的特点，使他在文学思想和观念方面形成了遍参前人，有为而作的风格。吕祖谦文道并重表现为他既有学识，又具文才。

于人们的认识上不到位、观念上不跟进、行为上不规范，总在不知不觉中浪费资源能源、破坏生态环境。其次，推广先行示范区与试验区建设的经验与做法，发掘和培育先进典型，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导向与实践典范。

第四，以优美生态与共享成果为主要载体，不断培育生态环境保护的物质文化，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彰显物质外化。由理念而制度、行为再到物质，由内而外，内与外之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生态物质文化作为生态文化外显的表征，是培育生态文化的物质具象与重要平台。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成就如蓝天碧水青山，人们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尤其是人们能够分享到，容易唤起和激发人们内心的生态情结与情感依存，增强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与自信心。鉴于此，首先，要宣传和推广“海绵城市”“绿色银行”“天然氧吧”建设中的先进典型与成功案例，让生态环境保护的物质文化广为传颂、深入人心；其次，在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试验区建立若干个生态文化展示馆，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向社会公众推广生态文化所蕴藏的理念支撑、制度范式与行为典范。

综上，通过顶层设计与区域创新相结合、理念支撑与制度范式相衔接、行为典范与物质外化相契合，不断推动生态文化教育的补位、生态文化宣传的到位、生态文化示范的进位，有效地凝聚观念认同、增强价值共识、促进公众生态参与，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发展。

他参与纂辑《徽宗实录》，出于著名史学家李焘的荐举，史称“《徽宗实录》置院已久，趣上奏稿，荐蔡吕祖谦学识之明，召为秘书郎兼检讨官”。又据《宋史·周必大传》：“上欲召人与之分职，因问：‘吕祖谦能文否？’对曰：‘祖谦涵养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吕祖谦不仅学养深厚，兼具文、史、哲各方面的修为，而且在南宋理学氛围浓郁、他本人又是理学家 的情况下，仍然十分重视文学，做到文道并重，颇有祖风。例如，他编纂的《宋文鉴》，该书在不妨碍“道”的前提下，注重所选作品的文学性，选择了辞藻华美，情韵深厚之作。

道德与知识并重。吕祖谦是一个不擅长辞令的人，自称：“某天资涩钝，交际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发明。”但是由于他崇道德、重知识，所以平易随和，待人诚恳，各学派的代表人物都乐意与他交往，他的相知好友最多，学术联系面最广，这对他学术风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朱熹几乎所有重要文字问世之前，都要先征求吕祖谦的意见，而吕祖谦总是认真阅读，坦陈己见。不仅如此，朱熹还曾特地把爱子送往吕祖谦处学习，可见他对吕祖谦的信任。吕祖谦与张栻有同门之谊，又与张栻两度共事，加之同巷而居，关系极为密切，“张丈邻墙，日夕相过讨论”，讨论的内容极其广泛，几乎无所不包。吕祖谦和陆九渊在乾道八年相识，身为南宋理学“心学”派旗帜的陆九渊与“理学”派领袖的朱熹学术思想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也一度影响到私人关系，幸有吕祖谦从中沟通，才使双方关系得到缓和。在陆九渊心中，吕祖谦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性理与事功并重。北宋亡国，中原尽失，南宋偏安，忍辱求和。吕祖谦治学性理与事功并重，表现在他既是理学家，又是经世派的中坚人物。其一，他反对空疏之学，主张实用。他提出“大抵为学，不可令虚声多，实力少”，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其二，他还主张立足于社会现实，求助于历史经验教训。他强调研究史学在于经世致用，非为史而史；其方法侧重于分析，不在记忆。“多视前言往行，考迹以观其用”。他告诫学生，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心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进，知识亦可高，方为有益”。“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后成败如何”。多加思考，才利于经世。